

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

——再解丁玲之謎

● 許紀霖

在中國當代作家當中，丁玲或許是最難以理解的。她成名很早，到延安也早，一度甚為得寵。1949年之後又是最早被拋出來，1957年成為「大右派」後流放到天寒地凍的北大荒。1980年代平反以後，卻比有所懺悔的周揚還「左」。在她的晚年，不喜歡人家提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再三說自己在北大荒是如何美好快樂，寫模範人物英雄事迹的特寫《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人們覺得這老太太的言行匪夷所思，不是過於矯情，就是腦子壞了。

丁玲，是一個難解的謎，許多評論家試圖走進她的內心世界，但都只是在外圍徘徊。作為知識份子的研究者，丁玲引起了筆者強烈的好奇心。她的靈魂是複雜的、雙重的，有文人的一面，也有信徒的一面。文人希冀自由，信徒渴望獻身，這互相衝突的兩面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丁玲。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正是那個時代革命知識份子的普遍精神症狀。

一 「我好比孫悟空，幹嘛要找一個緊箍咒呀」

一個人的終極選擇如何，要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與少年經歷。文學青年進入都市，是否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與家庭出身不無關係。筆者發現，許多左翼文學青年都有相似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富家子弟。若是貧民出身，他們所嚮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動，在都市裏找一個穩定的職業，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若是大戶人家出身，家庭會為他們安排好錦繡前程，這些官二代、富二代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之後，受亡國危機的刺激，才會投身革命。唯有那些曾經風光過、又開始走下坡路的官宦家庭的子弟，從小感受到世態炎涼，敏感而憤懣，最容易為左翼思潮吸引。

丁玲就是一個顯例。她原本姓蔣，蔣家在湖南常德安福縣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擁有一片一片的大房子。但丁玲的父親是個紈袴子弟，分

家之後，坐吃山空，給丁玲留下的印象總是躺在牀榻上抽鴉片。丁玲晚年回憶說：「總是講蔣家過去怎麼樣顯赫，有錢有勢，有派頭。可是我眼睛看見的，身臨其境的，都是破敗不堪，都是世態炎涼。」^①她三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在家族中從此受盡冷落，看夠白眼。回到母親的家——這個世代官宦之家，也給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記憶。她一直記得，臘月時分，舅舅把丫頭捆在牀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腦袋像敲木魚一樣。丁玲說：「正是這兩個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從這一盆火出發的。」^②丁玲童年的特殊經歷使得她對底層民眾、特別是女性的肉體苦難和精神痛苦特別敏感，形同身受，她既能寫出莎菲女士的內心苦悶，也能在《我在霞村的時候》中生動刻畫出一個受過日寇凌辱的鄉村女子貞貞對苦難命運的反抗。她的死對頭周揚對此頗為不屑：「丁玲說甚麼：『肩上擔負世界的痛苦』，擔負那麼多痛苦幹甚麼？這正是沒落階級的思想……」^③大地主家庭出身、從小裹在錦綉羅緞中長大的周揚，的確無法理解來自破落家庭的湖南同鄉丁玲童年積下的陰暗記憶。

丁玲與冰心是上個世紀20、30年代齊名的當紅女作家，她們的作品風格、人生姿態截然不同：一位是通體燃燒的火；另一位是淑女般柔和的冰。這與她們各自的童年經歷不無關係。冰心的家庭是安寧的、溫馨的，父母雙全，對她與弟弟充滿了關愛與柔情。冰心的童年記憶多的是母愛，但丁玲的童年更多的是恨。茅盾評論說，「如果謝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對於母愛和自然的頌讚。那麼，初期



丁玲成名早，名作家意識很濃，身上有一股孤傲之氣。(資料圖片)

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④。

丁玲走上文學的道路純屬偶然，她不是因為喜歡文學而寫作，僅僅是感到苦悶。她說：「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掙扎。」^⑤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兩個主題：苦悶與虛無。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之所以引起轟動，正是切中了瀰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虛無主題。

丁玲在平民女校的老師茅盾對她的了解最為透徹，他說：「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⑥。丁玲自己也說，莎菲女士「眼睛裏看到的盡是黑暗，她對舊社會實在不喜歡，連同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歡、不滿意。她想尋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個真正理想的東西，一個真正理想的人」^⑦。

五四之後的中國年輕人當中，普遍瀰漫着深切的精神苦悶，他們痛恨現實，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與希望何在，於是虛無主義成為一種時代病。大凡虛無主義者最後總是要尋求皈依，尋找新宗教，成為有信仰之人。丁玲的虛無是暫時的精神狀態，她在等待一次命運的突變，一次終極性的精神皈依。

丁玲最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是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求學期間，她在那裏遇到了茅盾、瞿秋白、施存統、李達等最早一批共產黨員。早期的共產黨是一個知識份子的政黨，他們在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在氣質上更接近傳統的士大夫，散發着濃郁的文人習氣，遠遠沒有以後那種類似清教徒團體的高度組織性與肅殺氣。對這些知識份子來說，革命與浪漫最初是合為一體的，創造社的蔣光慈就說過：「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⑩那時候，風流倜儻的老師與單純多情的女生之間，留下了許多師生戀的故事：瞿秋白與王劍虹、楊之華，施存統與鍾復光，沈澤民與張琴秋……在這樣的浪漫氛圍中，丁玲雖然與共產黨走得很近，也迷戀革命，但這種革命是羅曼蒂克的，充滿了文藝青年的幻想。從上海大學出來的早期革命者多是充滿了浪漫情懷的小知識份子，具有文藝青年氣質的丁玲尤為如此，她把革命浪漫化、浪漫革命化，自由、戀愛、文學、革命與社會主義，這些元素混雜在一起，如此地激盪心靈，讓本來一片灰色的生活，突然變得陽光明媚，充滿了激情與意義。苦悶之後，便是反抗；虛無之後，便是革命，這一切對於少男少女來說，都需要愛情的助燃劑，讓枯

乾的心靈燃燒，讓相互愛戀的身體萌發出反抗與革命的激情。

繼描寫都市青年的苦悶與虛無之後，丁玲小說的第二個主題便是革命加戀愛，這是她試圖擺脫苦悶與虛無的不二途徑。唯有投身於革命與戀愛的激流之中，她的內心世界才感到充實，精神方得以救贖。1929年她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裏面的人物在現實生活都可以一一找到原型：瞿秋白、王劍虹、柯慶施、施復亮、鍾復光，還有她自己。晚年的丁玲對這篇小說頗不以為然：「只有在講戀愛，講朋友，在這些兒女之情以外，加上一點革命的東西，把這些東西生硬地湊在一起。這樣的作品，自然不會有甚麼生命力」^⑪。然而，《韋護》當年在大名鼎鼎的《小說月報》連載五期，是非常叫座的，很能迎合大革命失敗後都市小知識份子的心理情趣。

丁玲嚮往革命，但她更愛文學，想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不願加入共產黨，甚至連左翼作家聯盟，最初她也不想參加。丁玲心想：「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我好比孫悟空，幹嘛要找一個緊箍咒呀。」她的老師瞿秋白，一個至死都懷着作家夢的資深布爾什維克，一直鼓勵她走文學的道路：「你嘛，飛得越高越好，飛得越遠越好。」^⑫此時她已經是與冰心齊名、甚至風頭壓過冰心的最紅女作家了。

對於丁玲來說，寫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當作家不是她的唯一人生，從幼年激發起的正義感始終燃燒着她的生命，而寫作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從此以後，投身革命將是更重要的道路。早年的共產黨有道德感召

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對底層民眾充滿同情。像丁玲這樣來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學青年，本來就是奔着個性自由來到都市，他們充溢着浪漫主義激情，對社會的黑暗又滿懷憤恨。自由、浪漫、憤恨和同情，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徑，丁玲統統具備了。只是之前她不喜歡組織，不想做一顆機器裏的螺絲釘，她想自由自在，不願加入組織。假如沒有丈夫胡也頻之死，丁玲或許一直只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胡也頻的死喚起了她內心的仇恨，她要為丈夫復仇，接過他未完成的事業。

丁玲1930年加入了左聯，擔任紅色刊物《北斗》的主編。原先她最喜歡寫的小說題材是革命加戀愛，但後來她在光華大學演講時，面對慕名而來的「粉絲」公開宣布：「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是一個缺點，現在不適宜了。」^⑩1932年，她在黨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產黨，丁玲說：我過去不想入黨，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後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夠了；現在我感到，只作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願意作一顆螺絲釘，黨需要做甚麼就做甚麼！^⑪

讓丁玲絕然皈依組織的，除了胡也頻之死，還因為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她的精神戀人馮雪峰，那是丁玲一生當中唯一讓她愛得刻骨銘心的男人。兩人幾乎是一見鍾情，被愛情擊倒，但那個時候丁玲與胡也頻同居，馮不想捲入三角戀，遠遠地避開丁玲，娶了自己的學生為妻。丁玲擔任《北斗》主編之後，直接在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的領導下工作。馮雪峰有文人氣質，但更多的是布爾什維克的堅定，這兩點都讓丁玲非常痴迷，缺了其中一個在丁玲看來都不算

完美：若只有文人氣質，丁玲周邊這樣的男人多的是，可愛而不可敬；若只剩鋼鐵般的堅定，又缺乏趣味，可敬而不可愛。而其貌不揚的馮雪峰，恰恰將文人的細膩與信徒的堅貞合二為一，丁玲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男人能像馮雪峰那樣了解她的作品和靈魂。他對她作品的點評，從最初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到後來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都讓她心悅誠服，崇拜得五體投地。在丁玲精神最灰暗的日子裏，是他的存在與鞭策讓她有了生存和奮鬥的精神動力：「雪峰說過假使冰之〔丁玲的字〕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那雪峰就不會愛冰之。正為了這句話，使冰之怕，怕失去這可貴的愛，冰之裝也要裝成一個有希望的人。」^⑫她要成為他所期望的人，一個有着堅定革命意志和忠貞信念的共產黨人，不再是多愁善感、浪漫情懷的女作家。在馮雪峰精神人格的照耀下，丁玲一步一步邁向革命的精神救贖，走入了有着同一意志與嚴密戒律的清教徒團體。

1933年丁玲被捕和在南京的三年軟禁生活，讓她深深感到失去組織、失去朋友的孤寂，一個人的堅守是如此地艱難，她疲憊軟弱，內心充滿了無力感，掙扎於絕望之中。西安事變之後形勢緩和了，丁玲有了一些活動的自由，她去見原先在平民學校的老師李達，希望通過他找到黨組織。李達雖然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他不習慣、也不喜歡布爾什維克黨的宗教氣質與嚴密戒規，他自願脫黨，做了一個黨的同路人。李達再三勸告已經出名的丁玲專心寫作，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更不要去找黨。但丁玲不聽，她像離

群很久受了傷的孤雁，急於回到熟悉的雁群，在那裏找到同伴，找到精神的慰藉。

終於，馮雪峰代表組織找到了丁玲，丁玲嚎啕大哭，好像失散多年的孩子終於回到了母親身邊。馮雪峰出奇地冷靜——不，應該說冷酷，他對她說：「你怎麼感到只有你一個人在受罪？有許許多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幾年裏也受着罪咧！」^⑭丁玲呆住了，瞬間感覺自己的渺小——比較起紅軍的爬雪山過草地，自己三年孤寂的軟禁生活，又能算得了甚麼？

原來組織希望安排丁玲到歐洲去，借助她作為名作家的國際影響為紅軍募捐，但剛剛擺脫囚禁生活的丁玲實在很怕一個人的孤獨，她死活不肯，要回到組織的懷抱，回到群體的溫暖。於是，她踏上了去陝北的征程。

二 「這是一個使徒的磨折」

抗戰時期的延安，以整風運動為界，分為早期與後期。早期的延安在精神狀態上是非常活躍的，中共歷史上有兩次知識份子入黨的高峰，第一次是在國民大革命期間，第二次是在「一二·九運動」之後，為抗戰和自由的激情所激奮的熱血青年紛紛奔赴延安，其中有許多來自清華、北大、燕京的大學生和上海租界的青年作家，寶塔山下聚集起一批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他們思想激進，舉止浪漫，嚮往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對社會的黑暗面異常敏感，有尖銳的批判意識。然而，按照共產國際模式所塑造的中共，是一個有着高度同一性信

仰與紀律的列寧式政黨，它要求所有革命的同志——無論是否黨員——必須克服自由散漫的習性，對黨組織與共產主義懷有不容置疑的虔誠信仰，絕對服從組織，像清教徒那樣有着堅毅的意志，具有墨子那樣的「摩頂放踵」的犧牲精神。於是，知識份子從都市中帶來的文人自由風氣與中共在農村的戰爭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團契化生活，逐漸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丁玲懷着尋找組織、尋找家的願望來到陝北，她是最早進入延安的著名大作家，中共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陳雲、任弼時、彭德懷對她非常客氣，他們還成了有私交的朋友。剛到延安，丁玲像眾多來到延安的知識份子一樣，讀的多是雪萊(Percy B. Shelley)、拜倫(George G. Byron)、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羅蘭(Romain Rolland)、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等十九世紀西方浪漫主義、意志主義作家的作品，身上洋溢着反抗黑暗、與天下為敵的意志衝動，有着強烈的個人主義英雄情結。她在窯洞裏貼了詩人裴多菲(Sándor Petőfi)的格言：「我要同運命來決戰，它不至於就完全征服了我，人生是如何的優美啊！我要聚千古生命於一身地生活下去。」^⑮她創作的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按照自己所欣賞的個人英雄主義模式，塑造了一個孤獨的、驕傲的和反抗的女共產黨員貞貞，以至於有評論認為貞貞完全不像一個農村姑娘，更像一個地主小姐或城市小資，言辭、行為、思想非同尋常。不錯，丁玲以自我的偶像想像共產主義女戰士，她不是一顆服從組織的螺絲釘，而是受盡苦難而精神不屈、頑強表現自我個性與奮鬥意志的拜倫式英雄。

此時，丁玲依然保持着上海時期文人的孤高、驕傲與任性，想到甚麼，見到甚麼，就要說出來、寫出來。於是，她寫了轟動一時的〈「三八節」有感〉，以尖銳潑辣的言辭激烈批評了延安的男尊女卑和等級制度。這種文章本來在上海寫寫算不了甚麼，但在延安立即招來了大麻煩。賀龍不滿地說：「丁玲，你是我的老鄉呵，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甚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毛澤東當時與丁玲的關係還比較親密，也提醒她：「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你就看不出來。」^⑥

然而，任性而單純的丁玲又如何看得出來呢！她只是一個充滿革命熱情的文人，完全不懂政治，更不懂得一個列寧式政黨要求革命者的只是虔誠的信仰，而容不得任何理性的質疑。丁玲善意的批評，本來只是對黨的「第二種忠誠」，然而在黨看來，對黑暗面的揭露，已經傷害了革命事業的神聖與純潔，特別是像丁玲這樣國內外知名的大作家，她的犀利批評更是羞辱了黨的尊嚴。丁玲晚年在談到這一事件時終於有所覺悟：老幹部「覺得寫文章批評領袖，有損領袖形象，不能容忍。我們打下這個地方，不是讓你們來批評的，都喜歡聽表揚」^⑦。

丁玲受到了很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不是來自黑暗的外部，竟然是來自革命大家庭的內部，來自自己的同志與戰友，「她終於懂得了延安與上海的不同，這裏有組織紀律約束，話是不能亂講的，牢騷不好隨意發的，作家不是自由職業者，而是黨領導的為實現革命目標而戰鬥的戰士，否則就為延安所不容」^⑧。她的個人主義意識與黨的團契精神水火難容，要麼離開延安，要麼改變自己。丁玲屈服

了，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低頭。此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了話，在多個場合對丁玲有委婉的批評。毛要作家「將屁股移過來」，從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移到工人、農民、勞苦大眾這一邊，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從北平、上海來到延安的知識份子的「三觀」被徹底顛覆了，原先的精英驕傲感如今成為了需要洗滌靈魂的原罪。丁玲更是惶恐，她出身於地主家庭，在南京被軟禁的三年又有說不清楚的「歷史污點」，她唯有屈服投降。

這種屈服，雖然不自願，卻又是自覺的。她從小就對底層的勞苦大眾有同情之心，痛恨社會的不義，早在上海辦《北斗》的時候，她就說過：「不要使自己脫離大眾，不要把自己當一個作家。記着自己就是大眾中的一個，是在替大眾說話，替自己說話。」^⑨不過，那個時代的大眾，對於丁玲而言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她以為參加了革命，加入了共產黨，就是在為勞苦大眾奮鬥。然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她惶然意識到自己還不是勞苦大眾中的一員，自己的立場有問題！剛到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丁玲「有名士氣派」^⑩，起初她還引以為豪。如今她才知道，這是領袖對自己的批評。丁玲成名早，名作家意識很濃，自我感覺良好，身上有一股孤傲之氣。在延安整風的時候，陳雲提醒她：「對於共產黨作家來說，首先是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作家。」^⑪她逐漸明白，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作家不過是政治化的個人，作家的靈魂不屬於個性，只能服膺黨，服膺革命的神聖事業。

在自由與同情、個性與服從、作家與戰士之間，丁玲始終是矛盾的，

她天生是一個作家，只有在暢快的寫作中，她才感覺到自由，感覺到靈魂的飛翔。但毛澤東反對的正是這種自由散漫、個性張揚的「自由主義」，黨要求每一個作家都是偉大事業中的螺絲釘，首先是工作，其次才是寫作。即使寫作，也要服從於黨的神聖事業，一切不是從個性、而是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擔任了領導職務的丁玲，最感痛苦的是工作與寫作的衝突，她不能像在上海那樣自由自在地寫作。但作家的本性難移，丁玲還是忙中偷閒，寫出長篇宏製《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至於周揚對她很不滿意：丁玲怎麼搞的，不願工作，只想寫作²²？1949年以後，丁玲在一個公開場合含着眼淚說：「我有一個丈夫，還有一個愛人，我的丈夫是工作，我的愛人是寫作，我總是想着我的愛人，覺得我不能戀愛自由。」²³其實，即使在寫作當中，丁玲也不是自由的，也不能自由戀愛。她寫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時候，雖然明白作家是黨的文藝工作者而不是自由職業者的大道理，但在具體寫作中卻常常陷於苦惱，她發現光了解方向、有了生活還不夠，還要懂政策，要按照黨的不同時期的具體政策來分析處理生活素材。腦袋裏的框框和顧慮愈多，落筆愈有千鈞之重，更多的不是創作的愉悅，而是顧此失彼的惶恐。

因為在南京的那段歷史遲遲得不到審查通過，再加上〈「三八節」有感〉闖了禍，丁玲感覺灰心喪氣，不被理解，遭受了很大的誤解。她私下對蕭軍發洩內心的怨艾：「我未來這裏之先……我是抱着怎麼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在冰窖裏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並不如我想的……是一家

人！」她耐不了延安的雨天，抱怨窯洞又小又冷，簡直是在坐土牢，不由懷戀起上海的雨天是多麼有詩意²⁴。丁玲在〈風雨中憶蕭紅〉一文中借懷人而吐苦水，給自己鼓氣。她從蕭紅想到馮雪峰和瞿秋白，說馮雪峰「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地無睹」，而瞿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²⁵。馮雪峰與瞿秋白都是她崇敬的偶像，她試圖從他們的命運遭際中尋找一點安慰，獲得些微堅持下去的勇氣。

在延安，丁玲與蕭軍的處境有點相似，都是個性張揚的名作家，也都受到一些打擊。據胡喬木回憶，延安文藝座談會最初的起因就是衝着這兩個人而來²⁶。丁玲與蕭軍一度走得很近，他們有共同的遭遇和牢騷，在延安也都很孤獨，需要彼此傾訴。丁玲向蕭軍訴苦，因為南京的經歷一無證據，二無證明，組織至今還在懷疑她是否叛徒，沒有恢復黨籍。蕭軍說：「政治的信仰這是一生的大事……一個人一生可以戀一百次愛，結一百次婚，但卻不能改變一百次政治信仰啊……」丁玲幾乎要哭出來了：「是啊！戀愛……沒有也就算了……（政治信仰）這樣磨難我，老實講我算要吃不消了……我不能忍受了啊！」她感到黨已經不信任自己了，甚至想離開延安，脫離組織，回歸自由之身。蕭軍很同情她，感嘆說：「這是一個使徒的磨折！」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於作叛徒的人

固然不愛，而把一個人逼成叛徒的東西——人或制度——比叛徒更加可恨。」^②

儘管如此，兩個人對黨的態度還是有微妙的區別。蕭軍同情革命，但他是非黨人士，是黨的同路人，但同路未必同心。丁玲是黨的人，視黨如自己的家、自己的親人，她對黨是有感情的。蕭軍發現^③：

我們雖然是在一個方向前進着，但我們總是有着一條界線存在着，她愛她的黨，以至於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給了黨！

當延安生活讓蕭軍愈來愈不堪忍受的時候，他的選擇是疏離黨，不願為了生存而改變自我。而丁玲則試圖將個性融合到黨性之中，向自己證明黨性就是個性，自己不是蕭軍那樣的黨的同路人，而是有着堅貞信仰和意志堅定的共產黨人。

三 「我相信黨，相信歷史總會為我作出公正的結論」

比起1949年之後的遭遇，丁玲在延安遭受的磨難只能算是小小的前奏。解放之後她風光了沒有幾年，便接連遭到更殘酷的政治打擊。之所以如此，與文藝界無窮的宗派鬥爭密切相關。列寧式政黨為了捍衛信仰的單一性與組織的嚴密性，必然有正統與異端之爭。傳統的文人相輕和宗派鬥爭，一旦被賦予了捍衛正義與黨的純潔性的神聖使命，便不復有良知的羈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對不同觀點、利益與派別的同志的迫害打擊，

變得空前殘酷，非置對手於死地而絕不收手，而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是神聖事業的真正信徒，是最虔誠的福音傳播者。

如前所述，丁玲的死對頭是「文藝界沙皇」周揚。周揚與丁玲在上海就屬於不同派系，到了延安，周揚領導的「魯藝」和丁玲為首的「文抗」，是文藝界的兩大山頭。周揚是有理論修養的大知識份子，從小養尊處優，對政策的領會能力強，甘願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有極強的權力欲，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要在文藝界一統天下。丁玲在黨內的資格不在周揚之下，在國內外的名氣要遠遠超過周揚，她看不慣周揚的領導派頭，更不服他的霸道，經常在場面上給這位「文藝界沙皇」難堪。而周揚也看不慣丁玲的明星做派，對她的桀驁不馴耿耿於懷，於是千方百計要整她，讓她在政治上垮掉，永遠翻不了身。誠如李輝所說：「宗派鬥爭意外地成為一帖興奮劑，在政治口號的背後，激發出所有捲入者的激情和創造性。」^④

在革命隊伍當中，有兩類不同的革命者：一種是浪漫的文人革命家，另一種是嚴苛的職業革命家。他們在角色和性格上迥然不同，彼此之間有很大的衝突。文人革命家生性浪漫，個性張揚，多愁善感，即使入了黨、參加了組織，也很難收斂自己的個性表現，習慣於以自己的思想詮釋黨的意志，與森嚴的組織紀律發生碰撞。而職業革命家是黨的整體意志化身，是組織紀律的堅定執行者。他們沒有自己的個性，黨性就是唯一的自我意志。在他們身上，更多的是布爾什維克式的冷血和鋼鐵般嚴酷的意志，少的是文人的浪漫與世俗的溫情。夏濟安在研究瞿秋白的時候，將這兩類革

命家稱為「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與「硬心腸的共產主義者」^⑩。顯然，丁玲屬於前一類文人革命家，而周揚則屬於後一類職業革命家。在文學領域，周揚的名氣遠遜於丁玲，但只要一進入權力的角鬥場，高下勝負立見分曉。王蒙說過：「丁玲是一個藝術氣質很深厚的人，她熾熱，敏感，好強，爭勝，自信，情緒化，個性很強，針尖麥芒，意氣用事，有時候相當刻薄。」^⑪缺乏政治敏感與不諳權力鬥爭的丁玲自然不是老謀深算的周揚的對手。

丁玲先是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被打成「反黨小集團」，然後在1957年成為文藝界的「大右派」，被發配到北大荒，在那裏度過了十二個春秋，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抓進監獄關了五年。箇中所經歷的苦難堪比古拉格群島，不僅是肉體上的磨難，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難忍之痛。文革中丁玲的兒子從蘇聯來信，宣布與她劃清界限，不再與她保持聯繫，讓她痛不欲生：「難道這是真的嗎？這會是最愛我的兒子此刻寫給我的判決書嗎？」^⑫她在北大荒的時候，一改往常的孤高，媳婦來探親，她領着到隊長和職工家裏去串門，拉好關係；在路上遇見誰，陪着笑臉個個主動打招呼。人家對她愛理不理，不冷不熱，她也不生氣。她不斷給組織寫信，匯報思想，表示已經徹底認輸，「更多地贖罪，把罪贖完了，才能得到安寧」^⑬。沉入社會底層的丁玲已經與延安時期不一樣，她堅強了許多，也不再多愁善感，在命運的困頓之中，反而萌生了強烈的生存欲望和勇氣。她後來回憶說：「我不能學『士可殺，不可侮』的那個樣子，那不是個好辦法。我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就是要

熬過去，要有一股韌性，不管你對我怎麼樣，我得活着！」^⑭

僅僅憑生存的本能，只能像動物一般屈辱地活下去，但對於丁玲來說，活着卻需要另外的精神支撐。在平反之前，兒子曾問她：「這些年裏，你是否一度萌生過一絲輕生的念頭？」丁玲搖搖頭：「從來沒有。我有信仰，有信念，我相信黨，相信歷史總會為我作出公正的結論。當然，我希望自己能活着見到這一天。」^⑮如果說過去的她更多地是一個充滿浪漫與反抗精神的文人的話，那麼遭遇苦難之後，她倒更像一個虔誠的信徒，內心的信仰似乎更堅固了。她說，受苦二十多年來，我在精神上從來沒有空虛過。因為我有信仰，有了信仰就不會空虛，就能挺過去^⑯。青年時代的丁玲，曾經是那樣地虛無與苦悶，回想一下，似乎有點「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味，如今當真正的苦難從天而降，丁玲反而從虛無與絕望中擺脫。那麼，支撐她內心的信仰究竟是甚麼呢？

用丁玲的話來說，可以稱為「四個相信」：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時間、相信歷史^⑰。許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幹部之所以能活下去，也與丁玲相似，相信歷史與人民最終是公正的，在末日審判之日，一切將真相大白，正義將降臨人間，邪惡將得到懲罰。歷史的弔詭在於，反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其具有所反對的對象的形式化特徵，無寧說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世俗化的上帝就是人民，一個大寫的、整體意志的人民。上帝的意志化身為歷史的意志，客觀的、不可抗拒的歷史發展必然規律。雖然歷史意志在人間的展現過程之中，有曲折、有倒退、有黑暗，但總的發展趨

勢是確定的、不可改變的。只要你活下去，堅持到最後，一定會看到歷史的末日審判一刻：彌賽亞降臨人間，人民的意志、歷史的意志最終呈現，冤屈將得以平反，好人將會進入天堂，壞人終將進入地獄。

在北大荒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裏，丁玲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虔誠信徒，她一直記得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的話：「一個共產黨員要挨得起冤枉。」^③她之所以不斷地寫檢討，承認各種莫須有的罪名，不是真的心服，而是由於這既是求生存的現實策略，又是一種堅定的信念，相信歷史的最後審判，相信彌賽亞的最終降臨：「我相信五年十年之後，事情的真相，黨一定會弄清楚的。」^④

丁玲所期待的彌賽亞，就是黨。人民意志與歷史意志都是抽象的，意志的主體在人間的呈現需要一個代表，而黨就是人民意志的受託者，是客觀歷史法則在人間的執行人。黨代表了人民整體的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按照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說法，是至上的、唯一的、整體的與不可分割的，而且永遠不會犯錯。黨的個別政策會錯，但黨的整體意志永遠正確。如果黨犯了錯誤，帶錯了路，那是因為黨內出了壞人。作為歷史意志的整體化身、人民意志的受託者，黨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現在我們明白，丁玲獲平反之後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當老外不解地問她：「共產黨執政以來你老挨整受苦，你為甚麼還相信共產黨」時，她為何會如此大聲地回答：「不是共產黨錯了，是一些人錯了，一些思想錯了。」^⑤對一個虔誠的信徒來說，錯的永遠是個別，而不是整體；黨是全

知全能的，犯錯的只可能是肉身的人，而不可能是永遠正確的人民意志及其受託者。

黨的意志，既是人民的集體意志，又是領袖的個人意志。領袖是黨的意志的人格化身。黨的領袖也有「國王的兩個身體」：一個是聖體，代表了黨與國家的整體意志，聖體是永遠正確的；另一個是肉身，領袖作為凡人也會犯錯，也會墮落。領袖的兩個身體，既是外部分裂的，又是內在合一的，就看他的肉身在哪種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整體意志。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最最重要的領袖，作為領袖他同樣具有兩個身體：「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整體意志，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顛撲不破、永遠正確的；但作為凡人的毛澤東的個人思想與實踐，有時候卻會違背作為人民意志的「毛澤東思想」，比如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反右、大躍進和文革。

如此來理解丁玲對毛澤東的矛盾態度，許多疑惑就會迎刃而解。丁玲到延安比較早，與毛澤東有親密的私交，毛唯一為同時代作家寫的詩，就是寫給丁玲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毛與丁玲，既是領袖與文臣的政治關係，又有男女之間的私人情感，其中的恩恩怨怨，外人難以釐清。丁玲寫了〈「三八節」有感〉，引起了毛的不滿，但毛還是認為她與王實味不一樣，對黨有感情，「有批評，但也有積極的建議」^⑥。毛在延安保了丁玲，她對此也深懷感激。1949年以後，因為丁玲的任性、特立獨行，毛對她愈來愈不滿，周揚遂秉承最高領袖的意志，將她打入九層地獄。丁玲對此心知肚明，對作為凡人的毛一直暗懷怨恨，但對作為黨的

整體意志化身的毛，卻始終有崇拜、敬仰之心。她有一句名言：「他對我不怎麼樣，不管，但我對他是一往情深的。」^④

這種對毛澤東的矛盾態度，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普遍精神症候。丁玲與周揚雖然在各方面是死對頭，但在對待毛的態度上卻具有同構性。周揚長期以來是毛在文藝界最得力的幹將，是黨的馴服工具，但在文革當中也被毛拋了出來，在秦城監獄囚禁了五年。迫害人的被迫害，吃人的被吃，晚年的周揚對此有刻骨銘心的反思，從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可以看出，在文藝界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毛的晚年錯誤有如此深刻的理論反思。即使如此，周揚至死對毛依然不脫崇拜之情。他在1950年代初曾經這樣對兒子傳授秘訣：「有兩個東西你要崇拜，迷信。一個是蘇聯，一個是毛主席。」^⑤到了晚年，在為《鄧拓文集》寫序時，他依然如此說：「毛主席有學識，能統一中國很了不起。雖然毛主席整了我，我也不恨他。我有信仰。」^⑥周揚與丁玲一樣，堅信代表着歷史整體意志的黨是永遠正確的，毛作為黨的人格化身依然是偉大的，作惡的只是像林彪、「四人幫」那樣的壞人，犯錯的也只是作為凡人的毛。晚年的丁玲與周揚依然對黨和毛的信仰堅貞如一；錯的只是猶大，不會是基督。由於缺乏對悲劇的真正認識，丁、周兩人始終不肯和解，丁玲認定是周揚陷害了她，錯誤的淵藪是黨內的叛徒，而非領袖本身。

經過二十多年的磨難，丁玲終於等到了平反的那一天。1979年「七一」前夕，丁玲參加了全國政協的黨員會

議，她無比喜悅地寫道：「二十一年了，我被攆出了黨，我離開了母親，我成了一個孤兒！」^⑦「黨呵，母親！我回來了……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這一天。」^⑧在延安時期，她以文人的犀利，發表了〈「三八節」有感〉，此刻她以信徒的虔誠，將充滿了感恩之情的文章取名為〈「七一」有感〉，以此表白徹底的脫胎換骨。

晚年的丁玲在各種場合、甚至不分場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傾訴自己在苦難中如何對黨的堅貞、對信仰的堅守，這使得她與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氛圍頗為不協調，許多人感覺丁玲簡直不可思議。其實，丁玲以誇張的文學語言所要證明的是：苦難降臨於自己，只是黨對信徒的考驗；最終歷史證明了，是我——丁玲，而不是周揚，是黨的最堅定的信徒！在丁玲看來，在苦難中對黨保持忠誠，不是為了獲得甚麼好處，而只是向黨證明，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選民——是最終得以洗滌原罪、靈魂得救的那個人。就如上帝考驗約伯，讓撒旦去折磨他最忠實的僕人，奪去了他的家產、兒女和健康，讓他生不如死，每天在苦難中煎熬。但約伯依然不改初衷，他將所有的苦難視為上帝的恩典，是對自己最寵愛的僕人的考驗，神的恩寵不是通過福、而是禍來展現的。好人受苦，不僅是得救的必要條件，而且是信仰的日常維護；通過忠僕蒙冤，上帝之名得以繼續被信從。因信稱義，因苦難而得救。苦難，是神的最高恩典；通向天國的道路，不是鋪滿了鮮花，而是布滿了荊棘；靈魂的得救，不是通過世俗的福分，而是歷經苦難依然堅貞如一。

對晚年丁玲的理解，亦應作如此觀。二十多年的苦難是如此沉重，讓她在肉體上痛不欲生，更是精神的折磨與人格的羞辱。然而，支撐她活下去，在失去尊嚴的日子裏保持生存勇氣的，是對黨的信念。她相信，這是黨對她的考驗，她要承受一切的苦難，向黨和所有的人證明，她是黨最忠貞的信徒，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她在後來回憶「牛棚」裏的囚禁生活時，說當時感覺是生不如死，死很容易，生很艱難，支撐自己活下去的，是意識到自己是共產黨員。雖然被開除黨籍十一年了，但她一直以黨員的標準自我要求，從未放棄^{④6}。

比較起肉體的生命，丁玲更在乎的是政治生命。她多次表示：「一個人失去了政治生命，就等於沒有了生命。」^{④7}在丁玲十八歲離開家鄉前往上海的時候，母親對她的叮囑只有一句話：要守身如玉！對於信徒丁玲來說，比身體的貞潔更珍貴的，是政治的名節。丁玲的名節感很重，她一生耿耿於懷的是，僅僅因為在南京被軟禁期間，為了「欺騙敵人」，寫了一張「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未經甚麼審訊」的字條，就有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污點，一直為組織不信任，周揚等人抓住這點不放，將她誣陷為叛徒。丁玲甚麼都能忍受，就是無法忍受對她政治名節的懷疑。晚年的丁玲之所以痛恨沈從文，就是因為沈從文在《記丁玲》中將她表述為一個軟弱的革命者、一個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沈從文筆下的丁玲恰恰印證了周揚對她的污蔑，這讓丁玲怒火中燒。誠如王蒙敏銳地發現的，她不敢直接挑戰周揚，只能將一腔憤恨發洩到曾經的密友身上^{④8}：

她無法直接寫文章批××〔周揚〕，對××，她並不處於優勢，她只能依靠黨。與××鬥，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黨內鬥爭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機會，當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與恪忠恪誠極忠極誠的表現。對於沈從文，她則處於優勢，她戰則必勝，她毫不手軟，毫不客氣。她沒有把沈從文放在眼裏；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幾十年謫入冷宮的罪魁禍首身上。

殘酷的宗派鬥爭，讓丁玲在1980年代復出之後，依然要以令眾人驚訝的極端、誇張的言行，向自己的死對頭證明：我不是叛徒！我是比你更貨真價實的黨的堅貞信徒！

經過反覆的折騰與無盡的等待，1984年夏天，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到首都醫院向丁玲宣讀了恢復名譽的9號文件。當丁玲聽到組織肯定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時，她脫口而出地說：「我可以死了。」這位曾經如此孤高、風光的大作家，在二十多年的苦難歲月中，支撐她活下去的，就是上帝對約伯式忠貞的認肯，那是神的最高恩典，她得救了。丁玲發自肺腑地抒發感恩之情：「黨給我恢復了名譽，我還有甚麼要求呢？我甚麼都不需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名譽比生命還寶貴，這等於是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啊！」^{④9}

1979年美籍華裔女作家於梨華採訪丁玲，丁玲向她表示自己在北大荒的最高理想就是當一個養雞隊長，於梨華不解地問：你是作家，無法寫作，那怎麼行呢？丁玲回答：「哎呀，你不理解……我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一個作家。」^{⑤0}從上海

時期丁玲不願加入組織，到延安時期被周揚批評不願工作、只想寫作，最終經過北大荒苦難的煉獄，丁玲脫胎換骨，似乎換了一個人，從自由散漫的作家蛻變為期盼恩典降臨的虔誠信徒。當1980年代眾多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重新回歸作家的本性與良知，連「文藝界沙皇」周揚對毛的左傾路線都有深切反思的時候，丁玲還是那樣不合時宜地顯得迂腐、不可理喻。難道丁玲真的是左派，真的變成一顆沒有了思想、失去了靈魂的螺絲釘嗎？王蒙對此有一個比較貼切的觀察，他舉了幾個例子，證明晚年的丁玲依然有個性，有作家的本能，她反對思想掛帥，公然說好的小說首先要看藝術性。這些挑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言論連王蒙都不敢說，丁玲竟然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了。她給青年作家上課，諷刺地說：「誰說我們沒有創造性，每一次政治運動，整起人來，從來沒有重樣過！」她還很得意地說：「甚麼思想解放？我們那個時候，誰和誰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裏像現在這樣麻煩！」王蒙認為，即使到了晚年，丁玲依然有年輕時代的明星意識，她與周揚不同，有強烈的創作欲、競爭欲和名家派頭，她與一些藝術大腕兒一樣，很在乎是誰掛頭牌、誰唱主角，因此很遭領導的討厭^⑤。

正是這種明星意識，讓晚年的丁玲在有着信徒的呆板形象的同時，依然保有了自己可愛的個性。李輝如此評價說^⑥：

明星意識對於丁玲，正是她人生意義的積極體現。……政治、文學在她那裏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結合着，所以

她特別看重自己作為左翼文學傑出代表這一地位。這便是與周揚不同的丁玲，也是與眾不同的丁玲。

晚年的丁玲還是丁玲，她不是平庸的螺絲釘，也不是僵化的意識形態左派，她只是黨的最虔誠的信徒。當執政黨從最初的信仰共同體逐漸蛻變為利益共同體的時候，丁玲依然將信仰視為最高的利益，因信稱義，因信得救。更重要的是，她的信念不是對黨的具體方針政策的無條件服從，而是有她自己的個性化理解，她服從的不是某個個人，而是黨的集體意志。為了黨的最高的善、最高的利益，對於她看不慣的人與事，她依然要挺身衛道。丁玲的位置，就在黨的整體意志與個別意志之間，她以她的個性來理解黨的整體事業，以此來衡量具體時期具體的人所體現的個別意志。具體的人會犯錯，而整體的事業永遠正確；對信仰的捍衛，就是對黨的神聖性的守護。丁玲將之理解為一種「韋護精神」，韋護菩薩嫉惡如仇，有個性，有批判性^⑦，而她所崇敬的老師瞿秋白正是「韋護精神」的人格象徵。丁玲的黨性裏面有其獨特的個性，而個性之上又有她自以為是的黨性。丁玲至死，既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又依然是一個任性的文人，她是矛盾的雙面，而這兩面又彼此鑲嵌，難捨難離。

在丁玲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寫下的最後一行字是：「你們大家高興吧，我肯定能成佛。」在神志不清的彌留之際，她喃喃自語：「我早成佛了。」^⑧一個至死對信仰忠貞不渝的信徒，相信自己因信而去受苦，因信而解脫，大徹大悟，進入了極樂淨

土；而一切作孽的惡人，將被打入九層地獄。她感覺很滿足，她成佛了。她的靈魂飄飄悠悠，到天上與她的終身戀人馮雪峰相會——一個像她一樣有着堅定信仰、又不無任性的共產黨人。

註釋

①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頁3-4；90；132；279；278；293；288；379；288。

㉓㉔ 許楊清、宗誠編：《丁玲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4；237。

㉕㉖ 陳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載《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113；122。

㉗㉘ 茅盾：〈女作家丁玲〉，載楊桂欣編：《觀察丁玲》（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頁205。

㉙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載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九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67。

㉚ 丁玲：〈答《開卷》記者問〉，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9。

㉛ 轉引自夏濟安著，萬芷均等合譯：《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55。

㉜㉝㉞ 丁玲：〈我是人民的兒女〉，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308；306；309。

㉟ 丁玲：〈我的自白〉，載《丁玲全集》，第七卷，頁2。

㊱㊲㊳㊴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上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50；60；51-52；56；80。

㊵ 丁玲：〈對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載《丁玲全集》，第七卷，頁10。

㊶㊷㊸㊹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下冊，頁461；550；560；498。

㊺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載《丁玲全集》，第五卷，頁135。

㊻㊼ 李輝：〈往事已然蒼老〉，載《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19；27。

㊽ 夏濟安：《黑暗的閘門》，頁3-4。

㊾㊿㊰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載《觀察丁玲》，頁329；326-27；323。

㊱㊲ 丁玲：〈黨給了我新的生命〉，載《丁玲全集》，第六卷，頁285；286、287。

㊳ 蔣祖林：〈回憶母親丁玲〉，《人物》，2000年第12期，頁85。

㊴ 丁玲：〈我這二十多年是怎麼過來的〉，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93。

㊵㊶ 丁玲：〈講一點心裏話〉，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67；66。

㊷ 丁玲：〈答外國駐京記者問〉，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146。

㊸ 丁玲：〈解答三個問題〉，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62。

㊹ 高華：〈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文化、權力與政治〉，載高華著，黃駿編：《歷史筆記》，第二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335。

㊺ 李輝：〈與周艾若談周揚〉，載《搖蕩的秋千》，頁211。

㊻ 李輝：〈與露菲談周揚〉，載《搖蕩的秋千》，頁201。

㊼ 丁玲：〈「七一」有感〉，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16。

㊽ 丁玲：〈「牛棚」小品〉，載《丁玲全集》，第六卷，頁10。

㊾ 丁玲：〈與美籍華裔女作家於梨華的談話〉，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29。

㊿ 丁玲：〈韋護精神〉，載《丁玲全集》，第八卷，頁91。

㊰ 陳漱渝：〈乾涸的清泉〉。轉引自李輝：《李輝文集·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頁184。